系列报道 | 为什么偶发事件如此考验人类应对潜在公共危机的能力?

Original T China Tmagazine 2/5

T REVIEW

T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STYLE MAGAZINE



能否得出确凿的科学论断 以及成功实施社会性的防控措施 又反过来受制于当时普遍的重视程度 和每一个人跳出自身偏狭的能力

这是系列报道的第二篇,对美国记者 Randy Shilts 纪实报道《世纪的哭泣》的「文本重读」。我们选择《世纪的哭泣》的理由在于,它不仅细究了一个国家如何错失了防控的黄金时期,也揭示了当悲剧发生时,患者与未感染的群体是如何在巨大的恐惧中分裂成两个阵营,而科学又如何受制于时代的狭隘的。自上世纪 80 年代出版以来,《世纪的哭泣》试图告诉我们的,至今仍然有效且有益,它的英文原名《And the Band Played On》既是讽刺,又是祝福。我们希望在阅读完这篇推送后,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情绪能消散片刻,正如作者黄旭东所言,「倘若我们能把自己置身于友爱的政治共同体,那么,无论最终科学在当下能解决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过于恐惧」。

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事件的前一天,美国科技杂志《Wired》刊发了一篇名为《对冠状病毒的宣战该降级了》(We Should Deescalate the War on the Coronavirus)的文章。「恐惧、互相指责和对病毒采取军事化行动都是徒劳的,我们最好适应周期性爆发的新常态」,该文作者社会学教授 Robert Dingwall 如是说。

恐惧,扩大化的道德审判、政治问责 以及不管有多大意义 都一定要做点什么来消除威胁的心态。

为何不效仿我们今日对待艾滋病的笃定态度? Dingwall 在文章结尾发问。文章伊始,Dingwall 论断我们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反应完全符合传染病社会学研究创始人 Philip Strong 从黑死病和艾滋病疫情中发现的三种流行趋势: 恐惧,扩大化的道德审判、政治问责以及不管有多大意义都一定要做点什么来消除威胁的心态。在 Dingwall 看来,相比我们当初对艾滋病的反应,似乎当下对这一病症的反应是一种可借鉴的进步 —— 接受艾滋病的暂时不可战胜,接受它潜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然而,若论艾滋病于现今人类世界的状况,从事艾滋病报道十多年、采访过近 900 位艾滋疫情亲历者的 Randy Shilts 可能不会完全同意 Dingwall 的看法。Shilts 的纪实作品《And the Band Played On》(直译《歌舞依旧》,中译本于 2019 年 12 月出版,译作《世纪的哭泣》,也不失切合原著主旨,下文统译为《世纪的哭泣》)提出的问题是,**凭靠美国傲视全球的综合实力,为何艾滋病最初没有在美国得到控制,反而蔓延?** Shilts 认为,原因就在于不够警惕和未及时采取有力的防控措施,直至过于恐慌的情绪纷至,**现实已是「世纪的哭泣」。**

站在已知的时间点上评估过往得失诚然比处于未知的时间点上作出明智的判断容易。然而,Shilts的「马后炮」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一个不同于 Dingwall 的批判性视角,更在于他恪守了一名新闻记者的本分,以近 50 万字的篇幅,忠实还原了艾滋病传播初期的全貌。琐细的编年体例暗示了作者的态度,微观大事件和大历史中的个体和他们的遭遇,或许就是我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这些问题本来就要求我们具备从微观上升到宏观的慎密 —— 何以把一个个病症归为新疾病?何以将其升级为值得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流行病和公共卫生事件? 这样的慎密下,我们才能面向未来思考什么才是当下恰如其分的反应和行动。

何以把一个个病症归为新疾病? 何以将其升级为值得全国 乃至全球关注的流行病和公共卫生事件?

和书名一样,《世纪的哭泣》开篇颇具戏剧张力: 1985 年 10 月,一代巨星 Rock Hudson 的死终于让社会各界广泛意识到艾滋病的威胁近在咫尺,不再事不关己; 忽然之间出现了要上学的艾滋儿童,要工作的艾滋劳工,出现了急需经费支持的科研人员。彼时,距离美国第一位同性恋男子罹患这一「怪症」已近五年,距离美国疾控中心刊物《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发表报告称「纽约与加州男同性恋者中正在不寻常地流传罕见肺囊虫肺炎和卡波西肉瘤」(后确认为 HIV 病毒感染后的并发症)已近四年。很快,一部分医生和专家们注意到这些病症还在吸毒者、女性、异性恋男性、婴儿和输血者中出现 —— 几年内,美国从 5 例相关病例报告发展为上万人已经或将死于新命名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几十万人感染。美国错失了在萌芽阶段防控艾滋病疫情的黄金时机。

这是怎么错失的?

《世纪的哭泣》中的这段剪影或许蕴藏答案: 1982 年,针对少数先知先觉的医疗人员、科学机构和男同性恋组织发出的风险警示,一位社会学家嘲讽这是「谬误的推理」,「大约 1100 万美国同性恋中仅有 278 人患病,很难说这是一场疫病」。

它的失败与成功有多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们能从偶发的、没那么相干又具体鲜活的 一个个病例上生发同理心和建立共识。 艾滋病疫情在大面积爆发前能否得到充分重视,受制于当时医学条件所能做出的科学论断。HIV 病毒直到 1984 年才由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患者体内分离,继而方能更直接地探明艾滋病的传染性和传播途径 —— 尽管此前,艾滋病病例已经呈现出集群性以及与性行为、输血行为的联系。 Gaetan Dugas 被称为「零号病人」,因为率先确诊的 248 名男子中,至少有 40 人要么与他发生过性关系,要么与和他发生过性关系的人有过性关系。然而,针对 Gaetan 的病理研究在当时没能找出病原,无法根本排除他们共同被某种催情剂毒害或被公共环境致病源感染的可能。 人传人的证据不够充分 —— 美国疾控中心强调,「我们不会隐瞒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卫生信息,但我们也不会草率地发布未经证实的信息」—— 科学呈现了它的审慎以及有限。

然而,Shilts 更希望我们注意的是,**能否得出确凿的科学论断以及成功实施社会性的防控措施又 反过来受制于当时普遍的重视程度和每一个人跳出自身偏狭的能力。**研究这一发病于少数群体的新病症,不被当时大多数科研人员和政府机构视为值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疫情,尽管死亡已经发生。主流媒体对新病症的态度是缄默,认为这是「其他人」不会感兴趣的报道,直到疫情传播突破边缘。而同性恋群体自己把这种病称为「同性恋肺炎」和「同性恋癌症」,认为这是恐同份子的又一次小题大做、借此质疑他们自石墙运动以来争取的性自由,**以至于部分同性恋者对防控建议心存抵触** —— **这是对社会固有偏狭的应激反应** —— **它变成了另一种偏狭。**

倘若我们能把自己置身于友爱的政治共同体, 无论最终科学在当下能解决到什么程度, 我们都不会过于恐惧。

正是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为何这类偶发事件如此考验人类应对潜在公共危机的能力: **罕见的病症出现了,它发作于被大多数人认为与自己不相干的少数群体身上,而这一少数群体又因为长久的压抑,急于在当下沉醉自我,敏感于被管控。**《世纪的哭泣》断片式的细密叙述不仅向我们表明,人类防控艾滋病的演进并非如历史大事记那般线性抽象,也在向我们暗示,**它的失败与成功有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从偶发的、没那么相干又具体鲜活的一个个病例上生发同理心和建立共识** —— 这不只是科学能如何的问题。真正构成《世纪的哭泣》血肉的是无法概述为观点的个体经历,它等待我们去感同身受。

当然,Shilts 也让我们看到,正是因为还有一批人怀着勇气、悲悯与救世之心,才使我们如今无需过度恐惧。Dingwall 强调我们面对新型冠状病毒不要过度恐惧当然无可指摘,但如何做到不过度恐惧,可能不只在于我们认识且接受人自身的局限性,不过分期待战胜——「人类不擅于处理偶发事件,新的传染病破坏了我们的秩序感、信任感和稳定感,现代医学的僭妄(hubris)又使我们忘记如何与自然共存,忘记了疾病、残疾和死亡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还可能在于 Shiilts 通过艾滋病的悲喜剧让我们看到的:倘若我们能把自己置身于友爱的政治共同体,那么,无论最终科学在当下能解决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过于恐惧。

策划:《T》中文版编辑部

撰文: 黄旭东

开篇撰文: 李森 设计: 子慜 编排: Lu Wang

卷宗Wallpaper* 新视线 NYLON 尼龙 WSJ. FOOD & WINE

KINFOLK DRITT FATHERS

COPYRIGHT © T MAGAZINE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